

里组织、互助组、居委会等基层熟人社会（草根）有组织地推进情念国家化。反过来看，基层熟人社会本身是由“乡规民约”等乡村内生的互助互惠规范支撑的等身大的世界，其间“互相监视”体制与互助互惠规范是表里一体、密不可分的，表现为一种悖论。从这一意义上说，情念国家化就成了一种扎根于基层社会的“有根民族主义”。

从结果来看，“有根民族主义”一方面由民众自发的克理斯玛崇拜维系，同时也导致了以民众的相互熟悉为基础的“互相监视”的社会规范。⁴⁸这与奥维尔以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为原型的小说《1984年》中描绘的社会不同，那里是一个“瞭望监视社会”：人们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全都被窃听器 and 探头所察知。这种社会只有在高度信息化的现代化背景下才会出现，生命循环的时间周期在那里受到制约，从事农林渔业的常民共同体已经衰退，使互相监视成为可能的熟人社会已经解体或消亡。在战争时期的日本，由于明治以来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已带有许多欧美式的“现代化”要素，来自中央政府的监视装置（如“特高科”）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农林渔业仍然在产业结构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此仍然是以民众之间的“相互监视”为主。由此看来，战争时期的日本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都带有浓厚的非欧美的“亚细亚”社会的特征。

[VIII]

时间意识与空间意识： “扭曲”和“时间的龙卷”

在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时期，中国的农民和农村并没有遭遇战乱或自然灾害带来的生存危机。对村庄和生活构成威胁的敌人销声匿迹了，自然也就不存在对于外来侵略者的抵抗。尽管如此，自朝鲜战争以后，美帝国主义的威胁被不断地加以强调。但是“美帝国主义”对于普通农民来说是肉眼和所有感官都无法把握的存在。这与陕甘宁边区的农民在1943年摆脱了危机之后依然能够感受到日军和

国民党军的存在很不相同。能否直接用肉眼等感官把握到外部敌人，意味着农民的空间意识是停留在等身大的生活世界，还是游离而出，也即涉及到“常民意识”的问题。

尽管存在着这种变化，在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之前，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限制民众在空间上的自由流动，包括对旅行也施加了严格约束，户口的转移事实上不再可能，因此农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被严格束缚于土地的状态。⁴⁹这与1940年代前期形成了鲜明对照，当时处于战乱和饥荒中的农民还拥有选择最后的生存手段的自由，也即离开村庄而成为一个流浪者。因此，从结果来看，与陕甘宁边区时代的根据地政权相比，到1958年，中国农民的实在空间和实际生活与抽象化了的空间意识世界之间的扭曲程度更加严重了，“情念国家”演进到了更高阶段。

即便毛泽东的中国有意强化这种“扭曲”，为什么严厉限制农民的空间移动，并将其紧紧束缚于土地的问题仍然是必须追问的。实际上，竹内好认为毛的中国将战争期间的根据地革命扩大到全国范围，从而增强了对于毛泽东的幻想，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在竹内看来，这种做法将催生一种新的非欧美型的民族主义，从而与建立在民族国家“国民意识”基础上的欧美式民族主义的扩张有着根本差异。

的确，异常狂热地加入人民公社的中国农民，对于具有一定国家归属意识的民族主义的出现具有某种推动作用。但正是这一点存在着应该注意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新岛淳良和山田庆儿曾把这种建立在根据地全面普及基础上的国家称为“共同体国家”，但是，“共同体国家”所设想的终极世界是消灭了国家本身的共产主义世界。⁵⁰也就是说，共同体国家只是通向理想世界的过渡期的国家。在过渡时期，借助于村落社会以熟人关系为基础的传统互助互惠规范，村庄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经过再组织化的改造更加符合“共同体=根据地”的本质要求，⁵¹与此同时，以人民公社为指向的村落再组织化，将行政空间由原来数百人的自然村骤然扩大

到村落联合式的乡一级,其人口规模也达到数万人。通过行政和政治空间的扩大,试图使农民的观念和意识空间从狭小的村落提升到辽阔的“天下国家”,并增强对它的归属意识。而为了确保这种意识空间的扩大不至于破坏农民实际所在的日常生活世界(熟人社会),所以要严格限制流动的自由。总之,“共同体国家”中的农民大众对“天下国家”的归属意识,并不同于欧美现代化模式中独特的公民意识,其国家性质也不同于“民族国家”。

之所以将中国农民在人民公社下迅速扩大的空间意识称为对“天下国家”的归属意识,而不是简单地称为“国家”归属意识,是基于如下的考虑。也即他们与民族国家的国民相比,将独特的政府官僚组织组成的国家组织认作“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国家”的归属意识,以及对于确立国家空间界限的“国境”的意识都比较淡薄。农民大众头脑中存在的并不是空间和物理上可以截然分开的“僵硬的”国家,而是空间疆界具有伸缩性的“柔软的”国家,也即“天下国家”,小仓芳彦曾经称这种国家为“领域国家”。⁵²

一般说来,在中国传统社会,当农民大众遭遇大规模战乱和自然灾害以及在此背景下地主的苛敛诛求,从而无法维持其正常生产和生活的时候,经常会外出流浪,或者以村落联合的形式组织起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规模的“造反”或“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卷入造反或革命的农民的空间意识,自然也会上升为远远超越熟人社会的“天下国家”意识。但是这与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农民的空间意识并不相同,后者存在着一种意识上的扭曲现象,也即在持有“天下国家”意识的同时,却维系着等身大的生活世界的意识。

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民的观念空间和实在空间意识上的扭曲,当然也意味着其时间意识的扭曲。这是因为,与传统的造反或革命组织不同,新中国的农民要面对着一种强烈的时间加速化的要求,也就是毛泽东所提出的“十年赶上英国”的要求。这与毛提出建立人民公社时中国的历史背景有关。当时,从19世纪以来的“西方的冲击”到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中国经历了一百多年漫长的岁月,而欧美的现代化特别是高度工业化已经完成,实现了时间高速化(效率化),构成了严重的外部威胁。也就是说,在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社会,时间在加速度地打着漩涡。当意识到可能会被这种时间上的高速“龙卷”现象卷入或抛起的时候,赢得了“战争和革命”胜利的毛泽东坚信同样可以赢得对于“欧美的现代”的胜利,从而提出了摆脱缓慢的时间意识实现时间高速化的目标。但问题在于,毛泽东所追求的现代化模式与欧美的现代化模式完全不同,后者是通过受到生命时间制约的等身大世界的解体,也即农业的淘汰来完成高度工业化和时间高速化的。也就是说,毛的人民公社力图将农民束缚在受到生命循环制约的等身大的日常生活空间,同时又把他们的空间意识从狭小的村落提升到“天下国家”层面。于是,与空间意识上的扭曲现象同样,时间意识上也必然出现严重的扭曲。

由于空间和时间意识上的双重扭曲,人民公社正如它必然如此的那样失败了。在2000多万人因饥荒而死亡,⁵³人民公社明显失败的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出席者多达7000人的中共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首次承认了失败,并进行了一定的自我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共同体国家”的思想。“自我批评”并没有指向前述时间和空间意识的双重扭曲及其导致的失政,而是集中于地方和基层干部(从省级到公社一级)的称作“浮夸风”的虚报,以及党的组织缺少“民主集中制”或者说功能瘫痪。换言之,在他看来,只要克服了“浮夸风”并恢复民主集中制,建立起与欧美现代化模式不同的独自“模式”并赶上欧美仍然是可能的,走上“超现代”或者说“反欧美现代”的道路仍然是可行的。

那么,毛泽东所说的缺少民主集中制意味着什么呢?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显示,是指党组织僵化的官僚主义造成了干部们普遍的明哲保身,上下级之间无法有效地沟通,真实的情况无法反映到上级,虚报和瞒报盛行,从而导致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和政策失败。毛泽东虽然也批评自己犯了官僚主

义的错误，但同时也将矛头指向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央领导层，认为中央应该对官僚主义的盛行负责。这一批判为1965年以后他将官僚主义者称作“官僚主义者阶级”并力图摧毁僵化的官僚组织奠定了基础。

在1943年刘少奇积极树立毛泽东的权威的时候，其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树立毛个人的绝对权威，而是着眼于党组织的钢铁般的团结和领导权威的强化。也就是说，他希望在克里斯玛与民众之间建立强有力的党组织，借助于民众对毛的崇拜来强化党的权威，这与毛泽东本人力图将自己与崇拜他的民众直接结合从而形成情念国家是不同的。在1956年4月赫鲁晓夫于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做出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之后，刘少奇的意图进一步增强。具体说来，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毛的个人崇拜受到了否定，党章中删去了“毛泽东”的字眼。1958年4月，毛主动提出退出第一线、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一年后的1959年4月，经朱德的推荐，刘少奇成了国家主席。⁵⁴到1958年8月建立人民公社的时候，虽然对毛的个人崇拜仍在持续，但是党组织专制的基础得到了加强。

问题在于，从大跃进失败后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开始，党对“三面红旗”路线所内含的根据地型国家或根据地型民族主义的反欧美式现代化的理念也进行了否定。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等党的领导人在1962年开始的经济政策调整中，大力推进号称“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企业自主权，以及农业的“包产到户”）⁵⁵的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政策。这种做法与欧美现代化模式有许多相似之处，明显是对根据地模式或共同体国家模式的否定。⁵⁶当然，毛泽东对刘邓的调整政策作出了强烈反应，最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党的官僚组织予以彻底的破坏和打击。

从结果来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政治上的空间意识涵盖了国际社会的同时，在时间意识上也密切注意到了欧美发达国家的时间加速化现象并试图与之对抗。结果到

人民公社时期，在实在空间方面依然坚持着受到自然生态系统生命循环制约的根据地模式，同时将观念空间大幅度扩展，在时间意识上则面临着时间加速化的任务，也即如何大大压缩本来受到生命循环制约的时间。

与这一问题相关，我们有必要再次联想到竹内好所提出的欧美现代的“自我实现、自我扩张”决定了“东方”（亚细亚）的衰退乃至“失败”⁵⁷的问题。具体来看，通过空间上的扩张和时间上的加速化这两种外延性的力量，欧美的自我实现、自我扩张正是对东方的“囊括”过程。以等身大的空间和受自然生态系统缓慢的时间制约的根据地模式，必然导致人民公社失败的原因也正在于此。但是由于毛泽东抱有对欧美现代化模式“必胜”的信心，所以最终未能意识到它的失败。用竹内的话来说，正是因为毛泽东没有自觉意识到“失败”，所以忘记了“持续抵抗”。在人民公社遭遇挫折之后，毛泽东又因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招致更大的失败，原因也在于这一点。

[IX]

毛泽东与刘邓：关于“失败的自觉”

在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招致的失败状况仍不被外界所知，直到大约20年后的1980年左右，超过2000万人死亡的惨剧才被披露。⁵⁸因此，竹内好直到进入晚年的70年代都并不明了上述情况。

如前所述，为了克服人民公社失败导致的严重经济困难，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领导下的党组织公然放弃了根据地模式，采取了接近欧美现代化模式的市场自由化政策。到1965年初，毛泽东开始明确地将这类官僚组织的领导人称之为“官僚主义者阶级”，进而呼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⁵⁹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文章《论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